

韓裔日名導 崔洋一 電影是時代的註腳



■ 崔洋一暢談對日本電影的看法。

崔洋一，是一位韓裔日本導演，目前擔任日本電影導演協會理事長。他的作品《血與骨》描繪了在日韓國人的艱辛生活與歲月，也曾擔任過電影《感官世界》的副導演。不久前，崔洋一來到香港參與「亞洲一體化」系列學術活動，並接受了本報記者的獨家專訪。電影是時代的註腳，這成為了崔洋一講述電影、時代、社會的話題源點。

■ 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

■ 展現明治時期日本擴張的瓷盤。



■ 崔洋一認為，港島高樓密佈，城市化特質超過東京。

崔洋一顯得和藹可親，平易近人，對記者提出的各類問題，也從不迴避。對於電影導演的才華評鑑，他提出了「導演的本領是撒謊」這一有趣的比喻。當然，他認為，時代一直在變化，但是電影要永遠保持青春的狀態，塑造出多元的價值觀——畢竟，在他看來，世界不能夠由一個價值觀去控制，電影的視角應當立體以及多樣化。

今次是崔洋一第五次來到香港。前四次訪港，有兩次是參與電影節的活動，另外兩次則是私人旅遊。與前四次來香港不同，今次來港，崔洋一第一次踏足並居住在新界。這種變化，讓他對香港有了新的感受：前往港島區會唔朋友，要轉四次車，第一次發現香港原來有如此長距離的感覺。在崔洋一看來，港島是一個金融中心，高樓林立；而新界，則是新市鎮的格局。但無論怎樣，崔洋一都認為，香港的高樓要多過東京。

別僅停留在懷舊心態

這不是崔洋一的隨性感慨。他告訴記者，自己的少年時代經歷過東京的變化，目睹了東京的城鎮化進程愈來愈大，經濟、政治的轉變，帶來的城市的擴大。崔洋一直言，在他看來，這並不是一件好事，因為從平民的角度看，很多舊時代的象徵無法保留。

崔洋一表示，在東京，有很多年輕人會以散步的方式去找尋舊城市的記憶。在日本的影視劇中，似乎也有了這樣的趨勢：不少連鎖店被模倣成為了古建築。但崔洋一覺得，這並不是原本的古物，所以不太贊成這樣的做法。他認為，自己很贊同青年人去記錄舊日生活的景色樣貌，但他希望新一代人不要僅僅停留在懷舊的心態中。

崔洋一具體分析指出，懷舊有兩類，一類是肯定的懷舊；一類是否定的懷舊。他說，不少日本

人喜歡去位於歐洲的巴爾幹國家旅行，因為發現那裡的風光和西歐完全不同，但是卻忘了：那裡在不久前還爆發過戰爭。因此，崔洋一概括「懷舊」時，使用了一句繞口但又充滿哲理的語句：不喜歡，有時也是一種喜歡。

日本批判電影減少

基於對二戰的反思，戰後日本的電影業曾一度充滿了批判色彩。這種批判性乃是建立在民主主義體制基礎之上。崔洋一說，尋找新的精神寄託，曾經是日本電影業的一度繁榮。但是隨着時代的變化，日本戰後電影出現了「由反思轉向光榮」的變化，煽動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電影開始抬頭。

電影，是時代的註腳。在崔洋一看來，日本曾經的批判類電影，例如大島渚的作品，乃是以戰爭為核心，實際上是在整理日本戰後的五十年。崔洋一說，日本反映二戰的電影，具有很強烈的受害者意識。然而大島渚的作品則批判了這種受害者意識。他對大島渚的解讀是：允許一個壞時代出現的，是老百姓自己。換言之，讓日本走上戰爭道路的，不僅僅是軍部的一小撮軍人，而是日本國民本身。

但如今，日本的批判電影已經愈來愈少。崔洋一認為，這與社會現實以及青年人的心態有很大關係。他對記者表示，日本的年輕觀眾不太願意自己的孤獨形象被描寫在銀幕上，也不相信未來會有夢想；日本的青年一代對「自己五米以內」的小世界較有安全感。換言之，在崔洋一看來，青年一代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。



■ 新版《日本最長的一天》劇照。 資料圖片

經歷戰爭影人漸遠去

戰爭是非常殘酷的。日本表現戰爭題材的電影非常之多。不久前，在香港上映了一部以日本二戰投降為背景

的電影《日本最長的一天》。崔洋一以這部電影為例，道出了戰爭體驗不同則電影情節不同的看法。崔洋一說，《日本最長的一天》其實有新舊兩個版本。香港觀眾不久前在戲院看到的是新版本。但是在數十年前則有一部黑白的舊版本。新舊兩個版本實質上有巨大的差異。他對記者表示，舊版的《日本最長的一天》，全體演職人員都經歷過二戰，所以在情節的表現上、特別是最後發動皇居政變的青年軍人的瘋狂刻畫上，顯得非常細微和到位；但是隨着經歷戰爭的人逐漸遠去，新版的演職人員則是戰後一代人，面孔不如舊版，現實感不強，戰爭的瘋狂感也消失了。比較具有時代特點的是：舊版中並沒有天皇的身影，但是新版中出現了天皇。崔洋一說，這與日本當下的社會氛圍有關。因為，在當前的日本，現任天皇具有鮮明的反戰色彩，也是捍衛戰後民主主義體制的象徵。

崔洋一坦言，新版《日本最長的一天》票房並不成功。在他看來，原作者乃是反戰立場，但是電影卻將反戰立場模糊化，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。同樣，一個相反的例子是：《永遠的0》，原作者持右傾化的立場，但是電影卻進行了反戰的處理，票房反而大獲成功。這是值得電影人深思的問題。

因為戰爭，中日兩國的關係，尤其是民間的國民情感，一直處在較為複雜的狀態。崔洋一說，他非常清楚，不少中國人對日本的印象，來自於電影。所以，電影在崔洋一看來，不僅是一種藝術形式，也是中日兩國青年人進行交流的平台。他認為，一個日本青年人，也許對中國沒有太多認識，但是他可能很喜歡三國的歷史，喜歡看電影，因此，電影可以發揮更多的交流功能。崔洋一表示，戀愛等題材的電影，其實是中日兩國青年人都共同喜好的。電影，能夠為國民情感的促進起到推動作用。

■ 文：徐全



■ 在香港舉行的和平論壇。

採訪手記：

新一代人的責任

崔洋一在香港城市大學進行講座時指出：二戰後的日本，通過《憲法》確立了民主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基本原則。可以說，這成為了戰後日本牢不可破的信念和價值。崔洋一表示，自己這一代的藝術家，為了守護這一原則，作出了很大的努力，如今自己老了，也期望新一代的年輕人能夠為此承擔更多、更大的責任。

的確，這種責任顯得非常重要，也似乎變得愈來愈緊迫。崔洋一對日本影視界近年來的評價和回顧，頗為發人深省。即便是在一些公營的日本電視台，播放的一些電視劇，似乎也顯得愈來愈具有恢復日本歷史榮耀、為明治維新和日俄戰爭而自豪的情感色彩。誠然，明治維新、日俄戰爭在日本的歷史中，具有非常重要和舉足輕重的意義，但也正是在這些歷史的脈絡中，日本逐步走向了軍國和擴張的道路，為鄰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。

因此，對日本的影視劇中所呈現出的某種所謂愛國色彩，確實應當抱有一種應有的警惕和關注。影視是歷史的鏡子，也是記錄時代的註腳和符號，如果影視成為了宣揚過往侵略戰爭的工具，則對新一代人的影響將是非常巨大的。

崔洋一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現實感和歷史感。他的《血與骨》曾經將日本殖民朝鮮半島、在日朝鮮人的生活、朝鮮戰爭等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階段在影片中加以刻畫，構成了恢弘的歷史畫卷。歷史是不能夠被遺忘的，守護歷史的記憶以及捍衛日本在戰後形成的和平主義的原則，是每一個人尤其是藝術家的責任，特別是新一代青年人，對此具有特殊的時代使命。

■ 文：徐全



■ 崔洋一來港出席學術講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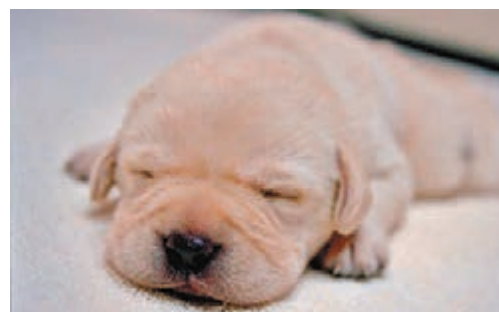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崔洋一與本港學生交流。



■ 《血與骨》劇照。

資料圖片



■ 《導盲犬小Q》叫好叫座。

資料圖片

你所不知道的崔洋一

崔洋一，韓國籍日本電影導演，於1949年在日本長野縣佐久市出世，因父親是朝鮮人，於1968年畢業於東京朝鮮中高級學校高級部，其後入讀東京綜合寫真專門學校，但中途退學，以照明助手身份正式踏入影壇，現為日本電影導演協會理事長，以及寶塚大學教授。崔洋一從影超過40年，由照明助手、助理導演到1983年正式執導演筒，憑處女作《十樓的蚊子》勇奪「每日電影獎」新人獎和橫濱電影節新人獎，奠定成功的基石。其後，他執導了不少出色的作品，並屢獲殊

榮，如憑《月出何方》拿下「電影旬報獎」、「報知電影獎」及橫濱電影節的最佳導演獎，亦憑北野武主演的《血與骨》獲得有「日本奧斯卡」之稱的日本學院賞的最佳導演、最佳劇本等共4獎。

此外，備受港人喜愛、掀起一股導盲犬熱潮的動物溫情片《導盲犬小Q》原來也是出自崔洋一之手，由松山研一主演，與太太小雪擦出愛火花；改編自漫畫的真人版電影《忍者戰場》同樣也是由崔洋一執導，可見其作品的多樣性。



■ 神風特工隊的瓷盤，日本不少影視作品亦以此為題材。

■ 文：徐全